

中國古代文體概論

褚斌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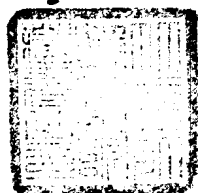
DZ47/20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

褚斌杰 著



20963123



北京大学出版社

963123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

褚斌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275 千字

1984 年 6 月第一版 198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90,000 册

统一书号：10209·66 定价：1.40 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体的发生和发展	2
第二节 中国古代文体的分类和文体论	16
第一章 原始型二言诗和四言诗	43
第一节 诗歌的起源和原始型二言体诗	43
第二节 四言体诗的发生和特点	47
第二章 楚辞	58
第一节 楚辞的名称和起源	58
第二节 楚辞体的主要特点	66
第三节 楚辞体的流变	72
第三章 赋体	78
第一节 赋的名称和起源	78
第二节 赋体的分类、体制特点和演变	88
古赋 (89)	俳赋 (96)
律赋 (102)	文赋 (105)
第四章 乐府体诗	108
第一节 乐府诗的名称和来源	108
第二节 乐府体诗的范围和分类	110
第三节 汉乐府诗的体制特点	114
第四节 南北朝乐府诗的体制特点	121

第五章 古体诗	125
第一节 古体诗的名称和范围	125
第二节 古体诗的体制特点	127
第三节 五、七言诗的产生和发展	130
第四节 古体诗的流变	147
第六章 骈体文	155
第一节 骈体文的名称和骈体的起源	155
第二节 骈体文的繁盛和发展演变	162
第三节 骈体文的主要特点	175
第七章 近体律诗	188
第一节 律诗的名称和分类	188
第二节 律诗的起源	191
律诗条件的逐渐形成 (191) 魏晋时期诗律的萌芽 (196)	
律诗的前驱——“永明体” (202) 唐代近体律诗的出现 (211)	
第三节 近体律诗的分类和体制特点	217
五言律诗 (218) 七言律诗 (227)	
长律 (230) 绝句 (232)	
第八章 词	246
第一节 词的名称和起源	246
第二节 词的体制特点	260
词调 (260) 词体的类别 (269)	
词的句式和声韵 (274)	
第九章 曲	285
第一节 曲的名称和散曲的兴起	285
第二节 散曲的发展变化	290
第三节 散曲的体制特点	295
散曲的体类 (295) 宫调和曲调 (302)	
曲的声韵 (304) 曲的衬字 (307)	

第十章 古代文章的各种体类	311
第一节 论说文	311
论和说 (313) 辩与议 (321) 原与解 (325)	
第二节 杂记文	331
台阁名胜记 (332) 山水游记 (339)	
书画杂物记 (348) 人事杂记 (355)	
第三节 序跋文	362
第四节 赠序文	367
第五节 书牋文	372
第六节 箴铭文	389
第七节 哀祭文	401
第八节 传状文	408
第九节 碑志文	416
记功碑文 (418) 宫室庙宇碑文 (420)	
墓碑文 (423)	
第十节 公牋文	430
表文 (430) 檄文 (434)	
后 记	439

绪 论

文体，指文学的体裁、体制或样式。文学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是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语言艺术。作者在从事创作时，为达到既定的效用，必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语言形式和篇幅、组织结构等，这样，就使文学产生了不同的类别，也就是各具特征的文学体裁。

各种文学体裁，是在作家的艺术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它与作品的思想内容一样，受着社会历史的制约，并且受着语言发展、作家创作才能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文学种类和各种文学形式也十分繁富多样。研究和了解我国古代众多的文体的特点，研究它们的发生、发展，以及它们彼此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而不断演变的历史，对于更好地阅读和理解古代文学作品，对于认识和掌握文学体裁的发展规律，以至推陈出新地为发展新文学服务，都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体的发生和发展

与世界上各民族文学开始产生时的情况一样，我国古代文学早在文字尚未发明的远古时代，就已经产生了。产生在当时原始时期的主要文学样式，是原始诗歌、原始神话和原始歌舞。创始于远古时期的这三种文学样式，从我们今天看来，虽然还十分简单，以至简陋，但它们对后世文学样式的发展和演变，却有重要影响。如以讲节奏、有韵律的语言来抒情言志的文学样式——诗歌，直到后世一直是文学体裁的重要一种。带有浓厚故事性的原始神话传说，对后世小说体裁的产生和发展，一直有重要影响。至于原始歌舞这一综合性表演艺术形式，也正是后世戏剧文学的起源。因此，文体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是一直可以上溯到原始时期的。

文学起源于劳动。有节奏、有韵律的语言艺术形式诗歌，最初就是在原始人类所从事的劳动过程中，伴随着劳动动作的节奏性而形成的。原始人在从事集体劳动时，往往出于减轻疲劳或协调一下彼此劳动动作的需要，而依照劳动动作的疾徐发出一种呼声。这种呼声具有一定的高低和间歇，因而形成一定的节奏。当这种有节奏的呼声与表达劳动者心声的提炼的语言相结合时，便产生了一种有韵律的、富于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这就是诗体的起源。产生在我国远古时代的原始型的诗歌，是短促的二言形式。这是由当时简单、短促的劳动节奏所决定的。

原始神话是最早产生的故事性作品。它们被记录下来的时间比较晚，在原始时代它们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广泛流传的。原始神话，也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周围的自然现象缺乏足够的科学认识和理解，因而便以幻想的形式来解释自然和表达他们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愿望，这样就产生了许多神话故事。我国远古神话，比较著名的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都生动地反映了原始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对自然界的斗争。它们飞腾的想象力和曲折动人的故事性，对后世故事性文体如小说、寓言、戏剧等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重大作用。

原始时代，歌、舞、音乐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关于原始歌舞的情况，从先秦和两汉古籍的一些片断记载中，还可以约略推知。如《尚书·尧典》上说：“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后世儒家说，这是写圣人当世，天下太平，百兽都来献舞祝贺。这显然是一种附会。实际上它所记载的不过是原始人的一种歌舞场面。所谓“击石拊石”，是指原始人敲打着当时仅有的石制乐器（那时连鼓还没有），所谓“百兽率舞”，是指一群原始的猎人装扮成野兽的样子，在乐器的伴奏下，欢腾地跳跃、舞蹈。这种歌舞或者是出猎前的一种宗教仪式，目的是向氏族的保护神祈祷，以求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归来后对俘获猎物的欢庆，总之，是与他们的劳动生活 and 生产愿望相联系的。在《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这大约也是原始人关于某种宗教仪式的歌舞。它的内容与他们当时的农、猎劳动有关。“操牛尾”，是描写他们歌舞时手拿牛尾做道具；“投足”，是说他们用踏脚来打拍子。下面的“歌八阙”，是分别描写歌舞所包含的八个内容和场面。“载民”、“玄鸟”，大约是歌咏祖先的由来和他们原始部落的图腾；依次则歌舞草木、五谷的生长；“敬天常”、“依地德”，则大约反映着当时人们对与生产有关的气候、土地的重视；最后“总禽兽之极”，是说他们狩猎所获猎物之多，或者是形容家畜的繁多兴旺。这种原始的表演艺术，正是后世戏曲文学的先声。

原始时期，是人类的童年时代。当时社会生活淳朴、简单，特别是尚未有文字，因此，他们虽有文学创作和文艺活动，初步创制了某些文艺样式，但大都还很简陋，还处在萌芽状态。

书面文学产生在文字发明以后。我国何时开始有文字，现在还不能断言。据西安半坡村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器来看，上面已有若干刻划的符号，很可能就是中国最原始的文字。而甲骨卜辞的发现，则可以确凿地证明，至迟在殷商社会中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我国已有了初步定型的文字，同时也有了用文字记载的书面文献。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商代和周初的铜器铭文，《周易》中的卦、爻辞，《尚书》中的殷、周文告等，可以说是我国散文的萌芽。所谓“甲骨卜辞”，是商代

王室进行占卜时，镌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简短记录，这些卜辞少则几个字，多则百余字，记录了当时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它们虽然很简短，但在记录人物、牲畜、时间、地点、方向上，比较准确，是我国最早记事文的萌芽和原始形态。铸在殷、周铜器上的铭文，有许多是纪功颂德的文字，是我国颂赞体文章的远源。《周易》中的卦、爻辞，产生的时代颇早，其中多有产生于商末周初的文字。卦、爻辞中的记事，虽然也很简短，但比起甲骨卜辞更趋完整，并具有某些生动的描写，有的还用简洁洗炼的句子表达了某种生活经验以至哲理，是我国古代散文萌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我国最早的成篇散文，保存在一部名为《尚书》的文集中。“尚书”即上古之书的意思，儒家曾尊它为经典，故又称《书经》。它是我 国一部古老的历史文献总集，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其中虞书和夏书，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某些传闻编写的，并非是什么虞、夏时代的作品，比较可信的是商书和周书两部分。商、周已经是奴隶制国家，当时已有史官的设置，《尚书》中的商、周文字，大都是由史官执笔记载的官方文告。其中有誓辞、诏令、诰言、训辞和政事语录等，按后世文体分类讲，它们同属于公牍文类中的下行公文。这些文章的体制，一直对后代中央王朝的公牍文体有深远影响。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共有诗三百零五篇。《诗经》中的作品，并非一时之作，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期，最晚的则出于春秋中叶。这一时期的诗歌，比起原始歌谣已有很大进步。四言为主的句式和重迭反复的

章法，是《诗经》时代诗体的主要特色。《诗经》中的作品都是可以合乐歌唱的，它们按风、雅、颂三类编排，就是与乐调有密切关系。有的还与“舞容”有关，如颂诗一类，不但配乐，而且有动作，可说是连歌带舞的歌舞曲。《诗经》中的作品，篇幅上有长有短，有抒情诗也有叙事诗，风格也多种多样。我国诗歌从最初的原始型的二言诗体，发展到《诗经》的四言体，是一个很大进步，它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语言的变化。

春秋时期至战国末年，是我国古代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表现在文学上便是散文的勃兴。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的论著，同时也就是重要的散文作品。这一时期散文的主要特点，是这些著作家们往往把哲理的思考、史实的记录与许多文艺手段结合起来。如他们在说理、记事时，极注意语言技巧，注意逻辑、修辞，注意谋篇构思，有时还调动许多形象化手段，这样一来，就使这些著作具有了双重性质，既是史学、思想或政论著作，又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具有了一定的文学价值。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历史散文，如《左传》、《战国策》等，它们在记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都能对某些历史场面作出具体描写，对人物的形象也很注意刻画。不少篇章，情节生动，很有故事性；而所写的人物也栩栩如生，具有个性。对于当时行人辞令、策士言谈的记述，也无不曲尽笔墨，翔实而生动，令人读后有如目睹亲聆一般。它们不仅对于后世的“古文”发展有影响，而且对于后世故事性体裁作品，如小说、戏剧的

发展都有深远影响。另外，这些史学著作在记述社会生活和历史人物活动时，往往把当时流行和使用着的各类文体，也如实地引录下来，这样就大量地提供了历史上的文体资料。如宋代陈骙在他所著的《文则》中，就曾对《左传》一书所载文体加以例述，他说：

春秋之时，王道虽微，文风未殄，森罗词翰，备括规模。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一曰“命”，婉而当，如周襄王命重耳（僖二十八年），周灵王命齐侯环（襄十四年）是也。二曰“誓”，谨而严，如晋赵简子誓伐郑（哀二年）是也。三曰“盟”，约而信，如亳城北之盟（襄十一年）是也。四曰“祷”，切而恻，如晋荀偃祷河（襄十八年），卫蒯聩战祷于铁（哀二年）是也。五曰“谏”，和而直，如臧哀伯谏鲁桓公纳郕鼎（桓二年）是也。六曰“让”，辨而正，如周詹桓伯责晋率阴戎伐潁（昭九年）是也。七曰“书”，达而法，如子产与范宣子书（襄二十四年），晋叔向诒郑子产书（昭六年）是也。八曰“对”，美而敏，如郑子产对晋人问陈罪（襄二十五年）是也。作者观之，庶知古人之大全。

陈骙在这里例举了《左传》所备括的八体：命、誓、盟、祷、谏、让、书、对，其实除此八体之外，还可以补充不少，如晏子之论“和同”，穆叔之论“不朽”，则属于论辩体；王子朝告诸侯，则属于诏令体；虞人之箴，正考父之鼎铭，则属于箴铭体；鲁哀公孔子之诔，则属于哀祭体等等。这些文体通过《左传》的录存，为后世文体发展提供了借鉴；同时也说明我国繁富的文体，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萌蘖，而且已有了相当的发展。

诸子散文，主要是说理文。最初产生的诸子散文，大都为语录体，而后才向有组织有结构的论说文形式发展。诸子散文的主要特点，是说理而具有文采。由于产生在当时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主张不同、流派不同，性格各异，因此诸子散文还明显地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如《论语》的雍容和顺、迂徐含蓄；《孟子》的灵活善譬，气势充沛；《墨子》的质朴无华，讲究逻辑；《庄子》的奇气袭人，想象丰富；《荀子》的层次清晰，论断缜密；《韩非子》的锋利峭刻，说理透辟等等，正是各具特色，新颖多样。这些诸子散文，在说理论事时，除讲究辞章的修饰和逻辑的严密外，还企图寄哲理于形象之中，从而运用和创作了大量的寓言故事。我国的寓言体作品，不仅产生于先秦时代，而且以先秦时为极盛。它既影响到后世寓言的创作和童话的创作，也对后世小说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在战国后期，诗体也有了新的发展。那就是继《诗经》古朴的四言体以后，在我国南部楚国地方产生了一种崭新的诗体——“楚辞”。“楚辞”的开创者和代表作家，是楚国伟大诗人屈原。“楚辞”，按其本义来说，就是楚地的歌辞的意思，它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拿楚辞与《诗经》相比较，其最显著的不同和进展，就是它的句式加长了，节奏变化了，篇幅扩大了。“楚辞”打破了《诗经》作品的以四言为主的句式，而代之以五言、六言、七言等长句。《诗经》作品的四言体，其节奏一般由双音顿构成，即每两字一顿，每句二拍。而“楚辞”则出现三字顿，在一句诗的拍节上则构

成了有偶、有奇，奇偶相配。虽然屈原的楚辞作品，在句式的运用上并不统一，但从它打破《诗经》短促的四言定格来说，实际乃是一种诗体的解放。同时，它也极大地扩展了诗体的篇章结构，或抒情兼叙事，或抒情、咏物兼议论，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楚辞”这一新诗体也并非凭空产生的。它是由当时我国南方楚文化哺育出来的一支新花。“楚辞”的产生受到楚地民间文学——所谓“楚声”和“楚歌”的直接影响。产生于“楚辞”之前的《诗经》，主要产生于北方，代表了当时的中原文化，而“楚辞”则是南方楚地的乡土文学。在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是南方的大国，占有江、淮流域广大地区。它在政治、文化上虽然早已与中原有着交往，但在很大程度上还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在宗教、民俗、诗歌、乐舞等各方面都有着独立的特色。楚地的民歌乐舞，特别是流行在楚地民间具有神话色彩的巫曲，以其特有的浪漫情调，参差优美的句式和韵律，启发着诗人的创作，对楚辞体诗歌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作品出现以后，不仅丰富了当时我国的诗歌形式，而且它在我国古代文体的发展中，起了多方面的影响。例如它对我国赋体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对我国后世五、七言古体诗的产生，都有过显著的影响和引导。

先秦时代是我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初期阶段。从我国文体史看来，也是我国种类众多的各式文体开始萌芽的重要

时期。我国文学发达，文体繁富，样式众多，而后世的许多文体一般在先秦时代即已滥觞和有所孕育。故古代文体论者，往往有“文出《五经》”的说法。如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就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尚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周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诗经》）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礼记》）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另外，刘勰的《文心雕龙·宗经》篇也有类似说法。这种把后世流行的各类文体，都归于所谓“五经”所生，显然不无牵强，但后世许多文体，在先秦时代就已产生，或已萌芽，还是符合事实的。特别是后世许多新兴文体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受到先秦文学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秦汉文学是在先秦文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秦代由于实行箝制思想、摧残文化的政策，朝代也十分短，在文学上没有什么建树。但出自秦相李斯之手的一些刻石文，如泰山、琅琊、芝罘、会稽等处的刻石，形式模仿雅颂，多是三句为韵，四言为句，是我国最早的碑文体，对后世碑志文有源流关系。

汉代最发达的文体是“汉赋”。我国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是战国后期的“荀赋”，当时还只是一种比较简短、通俗的文体。至汉代作家，则吸取了楚辞体的某些体制特点，又熔铸以先秦纵横家的某些散文辞采、气势，而创造了以铺张扬厉为特点的所谓汉大赋。汉赋是一种半诗半文的文体，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后世则随着时代

和文学的发展，演变为骈赋、律赋、文赋等多种形体。

汉代在诗体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汉代乐府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发展阶段。所谓“乐府诗”，是指由汉代音乐机关——“乐府”所搜集和演唱的诗篇。它是一种配乐的歌诗，其名称也即由乐府机关名称而来。汉乐府诗以杂言为主，并渐趋向五言。乐府中的杂言，句式长短随意，整散不拘。一篇之中，句式有时变化很大，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个字的句子都有。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诗之新制，亦复蔚起。《骚》、《雅》遗声之外，遂有杂言，是为《乐府》。”汉乐府的杂言体，到了唐代则发展出自由奔放的所谓“歌行体”，在我国古体诗中独具一格，唐代许多大诗人，都用这一形式写出了很杰出的作品。除杂言体外，汉乐府民歌中还出现了不少完整的五言诗，如《陌上桑》、《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等。从诗歌种类上说，乐府民歌还开创和发展了我国的叙事体诗。早在《诗经》中，已出现有某些叙事成分的作品，如《国风》中的《氓》、《谷风》、《七月》，《大雅》中的《生民》、《绵》等，但那些诗还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有的只做了某些客观铺写，有的仍是通过作品主人公的主观倾诉来表达的，还是抒情形式，因此，只能说它们是抒情诗带有叙事成分，是叙事诗的萌芽状态。而在乐府民歌中，则已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的故事作品，出现了人物对话和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如《陌上桑》、《东门行》和《孔雀东南飞》等，因此，汉乐府民歌标志着我国叙事诗的正式出现。